

人格化的国家和国家化的感动
：《感动中国》中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实践
马 岚（MA Lan）*

在后现代、多元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人们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和内心世界都异常纷杂，在这种境遇之中如何重新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重建核心价值体系，培植和巩固对于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就显得极为迫切而重要。随着时代的演变，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达途径和言说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自上而下的说教和重大理论的诠释，都无法与动员民众参与实践的作用相比拟，因而大张旗鼓的集体性运动和上纲上线的严肃说教日渐让位于一些更为柔软而迂回的方式，国家也从展演的前台逐步“隐退”到了幕后。

在现代社会，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担当了塑造国家意识形态和族群文化的重任(李朝阳，2010)，国家经常会借助这一看似中立的载体来表达意愿、赢取民心，为权力的存在和运用奠定合法性的基础。特别是当下比较流行的以仪式、典礼等形态呈现的媒介庆典，使得大众媒介与社会生活更深地互相嵌入，改变了在传播领域由意识形态机构主导的单一刻板的国家景观，同时也拓展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达途径，提升了传播的有效度。本文以 2002 年央视推出的一档颁奖节目《感动中国》为实践案例，近距离的观看这个电视颁奖典礼，解读其中的话语表达实践、意义生产模式以及社会认同的建构，揭示民族国家如何利用媒介庆典的形式来对人们的价值观进行塑造，展现出现代国家政权在新时期的宣传手段和教化途径。

一、政治仪式中的国家话语

“你已经多久未被感动了？有人说过一颗许久未被感动的心，就像一朵很久未被浇水的花”。这是 2002 年第一期《感动中国》的开场白。中国最主流媒体当年全新打造的一档人物颁奖类节目，就在这样一种基调中拉开了大幕。在开场的表述中蕴含着这样的判断：感动是完备人格美好心灵的必须品，但却日渐缺失成为稀有品。它预设了“偏离常态”的个人和社会——认知的离散、道德的缺失、核心价值体系的碎片化。在不会感动不易被感动的社会情境中需要引导人们被感动，形塑人们为何而感动，进而以“感动”为内核建构起普适性价值体系。“感动”这种原本该是极其私人化的体验，正如主持人所举的十岁小女孩的例子——“有一天我放学了，晚了一个小时，走出校门一看，我姥爷在寒风中等了一个小时，我就哭了。”但是借助大众传媒所构建的公共时空，这种私人情感因为实现了“共同在场”而具备了被塑造的可能性。

《感动中国》从始至终贯穿着一系列的仪式行为和仪式话语，在形式结构上也体现出一种完整的仪式性特征。仪式的存在与运用，往往能折射出象征符号与政治权力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陈蕴倩，2008）。正如格尔兹所说，象征、庆典和国家的戏剧形式是政治现实化的一种途径，是实现权力意愿过程中的动员手段（格尔茨，1999）。因而在更高层面上，媒介庆典又可以转换为“政治仪式”或“国家仪式”，成为一种国家景观，呈现出内涵上的丰富性。《感动中国》正是一个国家在场的政治仪式，旨在传达政治意义、价值观念和社会情感，进而造就理想国民，这是民族国家力量向民间社会渗透的重要方式。

*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所博士研究生。

1.仪式时间：《感动中国》的播出时间大致是在农历新年的初十左右，这个时间的选择也是有一定意义的。春节的庆祝活动和假期刚刚结束，人们重新返回工作岗位，一切步入正轨。这个时候对过去一年的重大事件进行梳理，对典范人物进行表彰，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为人们新一年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树立标杆，将这种感动的效果运用到未来一年的工作生活中去。之所以选择在春节期间而非元旦，正是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讲，春节作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所附带的文化意义远远大于元旦，人们更倾向于以农历新年作为生活事件和记忆言说的时间维度。这个通过大众媒介呈现的政治仪式极力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保持一种亲和性，以便于更好的被接受。

2.形式结构：《感动中国》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程式化表述结构，仪式过程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人物事迹介绍、获奖者亲身讲述、宣读颁奖词和荣誉授予。每位年度人物的推出由一段VCR引导，这个短片在几分钟的时间内要提供饱满的新闻信息，重心在于展现获奖人物的成就和事迹，在观众的脑海中建构出一个想象的英雄形象。而后邀请获奖人物或是相关人士出场，主持人对其进行现场访谈，实现“想象的个体”与“形象的在场”的重合。在现场访谈的环节，重心从事业成就转移到讲述个人付出上来，呈现获奖人物生活化的一面。接着是主持人宣读颁奖词，将人物的具体事件上升到宏观的、精神的高度。最后是颁奖，完成英雄人物的最后加冕。

3.国家话语：在《感动中国》作为公共性媒介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不论是在年度人物的选择上，还是在把年度人物变成“国家偶像”的仪式过程中，国家话语都起着主导作用。所推选出来的人物事件基本上都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在民族国家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党的好干部，清正廉洁，一心为民；(2)在自身领域表现突出，为民族和国家赢得荣誉；(3)以个人之力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做出巨大贡献；(4)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舍己救人，体现出利他主义精神。在人物身份上，专家学者、商界人物、政界人物、军警英雄、体育演艺明星是几个基本类别，已经形成固定范畴，他们都属于民族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年度主题上，当年具有广泛影响的重大事件、标志性人物都是必然入选的。如2008年度因为全国性重大事件较多，年度主题被固定在“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地震”、“奥运”与“神七”这四个重大事件上，11个年度人物奖项9项出自其中，比例高达81%，是历届人物评选活动中国家主题最显著的（莫继严，2012）。因而年度人物的选择就是国家形象人格化的过程。但是一旦被选定，又得努力把人物形象向国家符号转化。每位获奖人物的颁奖词因大量国家符号的注入而直接呈现出个人事迹与民族国家的关联性，如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推动了中国股市早日走上正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篮球运动员姚明“在一个强手如林的国家运动项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成为中国人的骄傲”；航天英雄杨利伟“承载着中华民族飞天的梦想，象征着中国走向太空的成功”；香港影星成龙“在国际影坛展现出中国影人的形象，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田径运动员刘翔“代表着一个正在加速的民族”；37年坚守诺言的陈健“坚守承诺始终是支撑人性的基石，对人如此，对一个民族更是如此”；蓝领专家孔祥瑞“150项革新，给国家带来8000万元效益，这就是一个工人的成就”；两弹元勋钱学森“国为重，家为轻，他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这些颁奖词通过为个人行为赋予国家和民族的集体价值完成了从微观个体到宏观层面的转换，在淡化了人物个性色彩的同时建构起一种集体形象，而作为个体的年度人物便是社会角色的浓缩，是国家形象人格化的结果，颁奖仪式即是对过去一年中国社会及中国人角色行动的“集体加冕”。这场媒介庆典实质上是国家在场并有效组织的政治仪式。

4.中心与边缘：仪式在举办的同时也预设了其参与和被影响的群体范围，在展演过程当

中通过不断强化“我们感”来划定群体边界，增加向心力。作为每年开年时刻在中国最主流媒体的舞台上展演的一场政治仪式，《感动中国》在时空上形成了一个关注的焦点，也构建了一个意义上中心的概念，同时中心也因将边缘的纳入而显得更具包容性。边缘既指地理位置上的边疆，也意指着经济文化的薄弱地区，因而少数民族和山村乡野是两个被关照的边缘，在每年的年度人物上都有所体现。历年的感动人物中少数民族人物有：地震灾难中全家5人遇难还带领群众抗震救灾的新疆琼库恰克乡6大队村党支部书记达吾提·阿西木；多民族孤儿的新疆妈妈阿里帕·阿力马洪；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巴铁汉才哇。属于驻守边疆奉献山区的人物有：贵州大山深处孤身支教的大学生徐本禹；重庆市北碚区柳荫镇的乡村医生周月华、艾起夫妇；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马班邮路邮递员王顺友；凉山彝族自治州悬崖小学的支教夫妻李桂林、陆建芬；26年义务守护滇池环境的农民张正祥；坚守藏区12年支教胡忠、谢晓君夫妇；投身四川凉山麻风康复村教育事业的台湾同胞张平宜；南沙守礁97个月中国军人李文波。《感动中国》通过借助国家传媒工具，打破时空界限、在同一时间点上将处于不同空间位置、具有多样性身份特征的成员凝聚起来，将少数民族和落后地区同主流群体精英阶层进行并置和呈现，赋予这些边缘地区以中心的意义，一方面重申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同时也增加了边缘对于中心的向心力，重塑了民族国家的认同。

二、学会感动——自然感情的国家化

能入选到这个节目当中的人物，仅仅符合意识形态的标准是不够的，关键的一点是要迎合人的感情需要，能让人“感动”。何为感动？如何能让人感动？这恐怕是节目设计者在酝酿过程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

首先要能够集中大众的目光，形成一定的观看群体。《感动中国》在表现方式上一改过去事迹宣讲式的报道策略，运用讲故事的叙事方式，聚焦于人物的心路历程和事件的细节上。这种细节的挖掘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政治所带有的严肃基调和刻板面目，具有了“狗仔队”般的“八卦”色彩，因而使得这场政治仪式更具可视性，产生一种“围观效应”。而在吸引眼球之后如何做到让人感动呢？从心理动力因素来讲，感动不同于崇拜或者敬仰，丰功伟绩本身并不能让人感动，让人动容的一定是艰辛、承担、付出或是有所舍弃，相对于励志性的“硬力量”，感动是“柔弱的软力量”（朱龚星，2012）。这样的情绪我们称之为“自然感动”。因而典型形象只有在呈现出作为普通人生活化的“软”的一面的时候，才是最能捕获人心灵的瞬间，所以关键就在于如何挖掘和包装这种生活化的动人因素。

在年度人物追求、付出、坚持直至获得成就的过程中大多伴随着对自己身体的不爱护、对家人的疏忽，或是甘守清贫寂寞，或是顶住外界重压。而年老、柔弱、疾病、死亡、离别、孤独是离感动最为接近的自然事件，极易唤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是故事的高潮也是感动的顶点。将年龄、性别、身体等自然因素与社会成就结合起来就极易渲染出煽情的效果来。比如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吴孟超，短片的第一个镜头是他为病人摆放床前的鞋子。90岁白发苍苍的老专家为病人摆鞋，这个行为即使是由一位普通老人来完成就很能打动人，再附加上他的社会身份——医学泰斗为病人服务，便使得这种自然的感动进一步放大和提升（何昊，2012）。再比如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代理人团团长王选，在介绍短片里反复出现的镜头就是她独自行走的身影，意指她奔走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诉讼之路上。这里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一项关乎历史事实关乎民族声誉的使命却由这样一个柔弱的女人独自承担，担子之重和人物的柔弱，路途的艰辛和她的坚持，这种反差正是能打动人的所在。又如马班邮路邮递员王顺友和他的马

在山间踽踽独行，入夜，王顺友坐在篝火旁喝酒，空旷的山间只有他不成曲调的歌声。这样的画面再配上解说词极易产生煽情的效果——“孤独是他生活的一种常态，甚至会在十四、十五天的时间里自己跟自己的歌声打交道，跟身边陪伴他的马打交道”。“20年，每年至少330天，在苍凉孤寂的深山峡谷里踽踽独行；20年，步行26万公里足可重走长征路21回，环绕地球6圈半；20年，没延误一个班期，没丢失一封邮件，投递准确率100%”（周建华，2007）。

在2002-2012年11期的感动中国当中，有16位获奖人物是已经离世的，有的是身患重病坚持工作到最后一刻的，有的是为抢救人民生命财产英勇献身的，有的是危难关头舍己救人的，还有的是为已经离世的著名人物……死亡作为人生不可逆的终极事件，在激发人的感情上是最有分量的。对于这种离世的获奖人物，往往会邀请其至亲或者同事来进行现场访谈，他们会将自己对已逝者的感情投射到自己讲述中去，声情并茂潸然泪下的场景对于观众来讲也是一剂很猛烈的感动催化剂。

当这种自然感动与人物的社会成就、被赋予的国家话语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因“柔弱的软力量”而产生的感动与宏大叙事激发的感染力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感动的国家化过程便会在无意识中自然而然的完成了。这份感动不再是个体而细微的感觉，英雄人物的主体性已成功转化为受组织认可的某种精神的表征，成为属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感同身受的一种群体心理，是能让国民普遍认可的一种价值判断。

三、日渐隐退的国家

即使本质上是一场政治仪式，但是《感动中国》在表现形式上在尽力降低其中的政治色彩，这使得无论从观看效果还是接受程度上来讲都显得更加平易近人。节目的推选委员会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组成，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文化水平和知名度较高、社会影响力强，此外在职业身份和专业领域上具有较广的覆盖面，如此以显示其作为媒体议程延伸的权威性与代表性，但同时又并非官员身份，可以提供独立的“民间声音”（莫继严，2012）。而实际上这些作为“舆论领袖”在人物选择和表述方式上都会处于“民族国家思维”的取向之中，他们实际上本身就是民族国家的社会精英阶层和代言人。年度人物的推选词也由他们来撰写，推选词和颁奖词都是采用了一种文学性的建构（周建华，2007），采用排比、对比、递进、转折等多种修辞方法，文字优美、语言精练，人文色彩浓重，规避了政治话语的“上纲上线”特性，将《感动中国》包装成了一台感人至深的精神与艺术盛宴。颁奖环节一改以往由官方机构授予荣誉由官员进行颁奖的做法，由小学生来完成。因为以感动为标准评选出来的人物由任何机构和个人来颁奖都显得不合时宜，那么索性由象征着纯真和希望的小学生来完成便不落俗套，此外当小朋友将奖杯和鲜花献给获奖者时，观众感受到的不只是获奖这一事实，而且感觉到了国家的希望，这种打动人心的组合也象征着民族精神的扩展和延续。

在十多年的历程当中，《感动中国》也在与时俱进，总的来讲标准越来越包容，视角开始关照微观，相应的年度人物在身份特征也发生着一些变化。最初几期的《感动中国》还是以丰功伟绩的宏大话语模式为主导，突出的是干部、军人、医生、知识分子、劳动模范和文体明星等“大人物”以及他们为国家所做出的“大成就”。2004年，从捐肾救母的当代孝子田世国和大山深处孤身支教的大学生徐本禹入选开始，节目导向发生了转变，一些“小人物”的身影出现在了感动的舞台上。我们把小人物定义为“没有显赫身份的普通人做出的奉献社会的举动，或是在日常生活中自强不息、体现了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和传统美德”。2005年，这样的“小人物”更是显著增加：三次跳入水中救人的河南小伙子魏青刚，大山里最后的赤脚医生李春燕，

带着妹妹上大学的洪战辉，37年坚守诺言的上海知青陈健，凉山彝族自治州马班邮路邮递员王顺友，青藏铁路的建设者等。笔者将12期《感动中国》中的小人物进行了统计（如图1），2005年、2009年、2011年、2012年“小人物”的数量都超过当年年度人物的一半。

图 1

年度	小人物					
	奉献社会		自强不息、体现传统美德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合计	占比
2002	0	0	0	0	0	0
2003	0	0	0	0	0	0
2004	1	1/11	1	1/11	2	2/11
2005	4	4/11	3	3/11	7	7/11
2006	2	1/11	1	1/11	3	3/11
2007	0	0	3	3/11	3	3/11
2008	2	2/10	1	1/10	3	3/10
2009	4	4/11	2	2/11	6	6/11
2010	2	2/13	2	2/13	4	4/13
2011	5	5/11	2	2/11	7	7/11
2012	4	4/11	2	2/11	6	6/11

如果说乡村支教的徐本禹、大山赤脚医生李春燕、26年义务守护滇池环境的农民张正祥、马班邮路邮递员王顺友、为留守儿童办学的女大学生李灵还带有“爱国敬业奉献坚守”的“螺丝钉”精神的话，那么田世国的捐肾救母、陈玉蓉的割肝救子、带着妹妹上大学的洪战辉、坚守诺言的陈健、携妻照顾初恋女友的韩惠民、身残志坚的少年黄舸的则是彻底的私人事件，所做的并不超出个人、家庭、友情、爱情的范畴，这些因涉及“私人事件”的人物登上国家舞台似乎表明国家涉入程度的弱化，但这背后有着一定的社会背景，它实际上是以一种更为隐形的途径昭示了国家价值指向。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在物质生活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生活场景的迅速变迁使得生活方式、价值体系较之前产生巨大断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与传统叙事的方式遭受巨大冲击，同时却没有建立起一个能为国民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于是，如何重建共识，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治国者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某种道德和观念上的共识对于公民的素质的养成、社会的整合是十分重要的。这样一种社会资本，只能由宗教或文化传统提供（陈明，2007）。传统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的一笔财富，也是极易动员民众的历史资源，以“忠”、“信”、“笃”、“敬”、“义”所代表的传统美德便成为救世的一剂良药。随着一些社会问题越来越引人注目，如义务教育的困境、见义勇为的尴尬、诚信质朴的缺失、亲情爱情的疏离等等，一些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树立了榜样的小人物非常让人感动。正是因为他们的平凡普通，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卑微的存在，越发具有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力量，在熟悉和朴素中更直接地达到人的内心，起到教化的作用。因而《感动中国》为国家巧妙地植入其意识形态提供了足够的弹性空间，这场看似是草根英雄人物评选庆典背后，挥之不去的，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子”，在观看聆听别人的家庭故事的时候，以巧妙的方式，悄悄完成了将国家导向置入其中的使命。

在现代社会里,人的情感越来越成为外在的社会力量(组织、权力和资本)的控制对象。与此同时,情感表情逐渐符号化了,情感的沟通越来越成为一种以大众传媒为主导的、单向的形式,越来越成为可以由权力团体借助于大众传媒所操纵的过程(王宁,2000)。在传统宣传形式式微的情况下,国家意识形态灌输开始探索表达途径的创新,《感动中国》正是借用了最身体化、感觉化、私密化的一种方式,来实现传播的渗透性与易传输性。又因构建了一个仪式性的场景,将平时潜在的、零散的情感在仪式这一具体时空中被激发、集中起来,仪式场合调动起来的感覺很容易转化为高涨的情绪爆发出来,这种爆发可以衍生为强烈的克服艰险生死与共的情感升华,持续不断地激起有关社区、国家,与民族的集体理想与认同感,成为社会动员的依托。

参考文献:

- 李朝阳,2010,《“春晚”的身份定位与功能前瞻》,《探讨与争鸣》第5期。
- 陈蕴倩,2008,《谒陵仪式与民国政治文化》,《开放时代》第6期。
-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利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莫继严、麦尚文,2012,《新闻仪典、公众性格、国家符号——<感动中国>影响力生成机制探析》,《电视研究》第5期。
- 朱龚星,《从“感动中国”看新时期典型人物的选择与报道》,《中国记者》第5期。
- 何昊、张兵,2012,《寻找感动的力量——<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颁奖晚会创作谈》,《电视研究》第4期。
- 周建华,2007,《打造精神与艺术的盛宴——析<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的文学性修辞》,《新闻爱好者》第3期。
- 莫继严,2012,《大型电视年播节目的运作与社会资源开发路径——以CCTV<感动中国>栏目为例》,《新闻知识》第1期。
- 陈明,2007《公民宗教随札》,《原道》第十四辑。
- 王宁,2000,《略论情感的社会方式——情感社会学研究笔记》,《社会学研究》第4期。

作者简介:马岚,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所博士研究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